

論鄭觀應的道緣與道界關係

——以《盛世危言後編》為線索*

邵 建

[提 要] 由於幼年即受哮喘病困擾，在求醫問診得不到明顯改善的情況下，年幼的鄭觀應便跟隨父親四處探尋道士方術，自此結下道緣。中年以後，鄭觀應的事業幾度沉浮，遇到難以克服的人生低谷，便返回澳門著書與修道，在長期的修道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道學思想與理念。鄭觀應晚年的健康狀況更加糟糕，為延年益壽，更多地將精力和精神寄託於修道成仙，與道界人士建立了廣泛而又複雜的關係網。本文借助鄭觀應晚年整理出版的《盛世危言後編》，尋找其中與之修道相關的線索，並以此展現他與道界人士的龐雜關係。

[關鍵詞] 鄭觀應 《盛世危言後編》 道學 道界

[中圖分類號] B95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7) 04 - 0174 - 08

鄭觀應自幼身體羸弱，長期遭受哮喘病困擾，在求醫問診得不到明顯改善的情況下，年幼時便跟隨父親四處探尋道士方術，自此結下道緣。中年以後，鄭觀應的事業幾度沉浮，遇到難以克服的人生低谷，便回到家鄉澳門著書與修道。晚年的鄭觀應，英雄遲暮，健康狀況更加糟糕，迫使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入室修道方面，試圖修道成仙，改善健康，延年益壽。在長期的修道過程中，鄭觀應與各方道界人士建立了廣泛而又複雜的關係網，其中既有志同道合者，亦有基於修道之共同興趣者。研究鄭觀應與道界人士之間的複雜社會關係，有助於更加全面深入地瞭解鄭觀應的人生經歷和思想世界。對於鄭觀應的修道經歷及其在道學方面的貢獻，學術界已多有關注，湧現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①這些學術成果雖然大多已論及鄭觀應的修道經歷和道教思想，但鮮有全面述及鄭觀應與道界人士的關係。鄭觀應晚年整理出版的《盛世危言後編》（以下簡稱《後編》），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也為以此展現和還原他與道界人士的龐雜關係提供了可能。

* 本文受德國埃爾蘭根—紐倫堡大學國際人文研究院“命運、自由及預測：東亞和歐洲應對未來的策略”（Erlangen-Nurember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Fate, Freedom and Prognostication. Strategies for Coping with the Future in East Asia and Europe”）項目資助。

一

修道成仙之說雖古已有之，但絕大多數人也只是道聽途說，親身參與並長期專注者畢竟在少數，常人尤其是家人難以理解也在情理之中。鄭觀應從未掩飾自己對修道成仙的渴望以及實際行動，對於自己數十年尋道、修道、修仙的心路歷程，在他的通信、詩詞，特別是《後編》中都有詳細的交代。不僅如此，他還傾注心血，或出資，或親自整理、修訂道藏經典數十種，足見他對道學的虔誠之心。鄭觀應作為晚清時期維新思想的積極鼓吹者甚或旗幟性人物，囿於身體原因和現代科學知識所限，其熱衷道學並非個例，正如熊月之先生指出的，“無論是對於近代以前的傳統士大夫，還是近代以後接受過近代科學洗禮的新式讀書人，命理文化都是個灰色地帶，……浩浩湯湯的科學主義潮流，並未能將命理文化沖蕩一空”^②，這也許是除了強身健體和延年益壽的現實需求之外，鄭觀應對修道成仙的執著追求和深信不疑的重要原因。

鄭觀應的代表作《盛世危言》貫穿著“富強救國”的理念，體現了他完整的維新思想體系，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給甲午戰敗以後沮喪、迷茫的晚清末世開出了一劑良藥。該書深得孫家鼐、鄧華熙等一干大員乃至光緒皇帝讚賞，張之洞曾稱許“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之統籌全域擇精語詳”、“上而以此輔世，可謂良藥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③《後編》雖仍沿用《盛世危言》書名，但並不是《盛世危言》的修訂完善，內容與《盛世危言》也大不同。該書最初編成的時間是1908年^④，正式刊行的時間夏東元先生認為是1921年^⑤，而據鄭觀應“自序”，該書最後定稿時間是宣統元年中秋，即1909年秋^⑥。《盛世危言》所寫主要是政論，內容與維新變法直接相關，如《商戰》、《電報》、《船政》、《火器》等；《後編》所收文章為多為序言和信函，內容涉及道學、維新、家事等諸多方面，如《道德經》序、《致督辦南陽公學盛京卿書》、《上攝政王請速行立憲書》、《訓長男潤林並錄寄月岩弟》等。兩書所收錄的文章形式不同，側重也不同，《盛世危言》學術性較強，《後編》則更加突出應用。同時，由於《後編》收錄了鄭觀應自認為最重要的書信往來，這給了研究者通過《後編》梳理其社會關係網，特別是為鄭觀應的道界關係研究以及循此線索瞭解其修道活動提供了重要佐證。

二

《後編》突出了修道對於鄭觀應強身健體和生命延續的重要性。

鄭觀應早年即醉心於修道成仙之術，晚年更進一步癡迷，實際上與他的身體狀況有直接關係。他以羸弱之軀，享七九陽壽，修道達到了一定的效果，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這在《後編》的諸多文章中都有所交代，如：

官應弱冠時櫻疾病，自念“人為萬物之靈，豈有壽不如龜鶴”。銳志求道，凡三教經詩、諸子百家、占卜術數之學，靡不研究。及長，謀食市廛，奔走南北，數十年來，聞有抱道高人，必厚禮虛心叩以性命之學。^⑦

弟幼年……讀道家《唱道真言》、《金華宗旨》、《青華秘文》、《定觀經》、《日用經》、《心印經》、《胎息經》、《道竅談》，釋家《多心經》、《慧命金仙證論》、《童蒙止觀》諸書，知三教聖人修身之道，先須正心誠意。^⑧

少時有三大願：一願學呂純陽祖師得金丹大道，成己成人；二願學張道陵天師得三甲符籙之術，澄清海宇；三願學張三豐真人得黃白之術，令各州縣多設工藝廠以養貧民，並設格致學校以育人材。自愧德薄魔重，一願未酬。惟涉獵三教經書，遍訪仙真，數十年來歷經險難，備嘗艱苦，致老不倦。^⑨

鄭觀應修道有家族傳統，父親文瑞也是非常執著修道、熱衷道學之人，平時就非常注重修身養生。鄭觀應自小身體底子較差，孩童時期已經罹患哮喘病。哮喘是一種比較頑固的慢性支氣管疾病，即便實在醫學高度發達的今天，也很難徹底治癒，何況是在醫學和醫療條件極度落後的晚清時期。不過，中國傳統文化向來並不缺乏修身養生之學，與中國傳統醫學相近，道教強調“天人合一”，注重規律的飲食與作息，鍛煉與養生，比如太極和氣功，這些東西長期堅持對於強身健體的確會有明顯的效用。所以，父親帶著幼年鄭觀應四處尋醫問診，乃至求助於道士方術也在情理之中，鄭觀應很早與道教結緣即源於此。關於求道的大致時間，鄭觀應在《後編》中同樣有所交代，如“竊念童年訪道，於茲四十餘載，屢遭方士所騙，備嘗艱苦”、“觀應自童訪道以來，於茲五十載，遍游海嶽，變產力行。德薄魔重，迄無所成”^⑩等。此種對自己艱苦訪道歷程的傾訴文字，在《後編》中出現了不下數十次，足見修道對於鄭觀應的重要性。

鄭觀應晚年“痰喘益劇”^⑪、“哮喘日重”^⑫，身體非常虛弱，冬天怕寒、夏天害熱，頑疾哮喘時而發作。在與盛宣懷的諸多通信中，多有通報病情、求醫問診、病假休息的內容。他去看中醫，醫生對他的診斷是：

所見各象脈細弱，□氣時或上擠，間或作喘，暑熱蒸逼則四肢□熱，心煩意亂，坐臥不安。看似肝氣上茂，實則中氣大虧，暑熱相逼而來，氣不足以當之也。^⑬

又如：

年逾古稀，氣血兩虧，肺疾頗重，肝火上炎，心脈極弱。^⑭

慢性疾病的治療非常困難，非得對症下藥和靜心休養，才能見效，在當時的醫學條件下，僅靠吃中藥調理，難以達到良好的療效。晚年鄭觀應對修道成仙到了極其癡迷的程度，在某次進行焚香禱告的活動中，他曾向“老祖師”真情告白：“伏乞老祖師垂鑒後學數十年訪道好義、變產力行及屢受室人交謫之苦衷，大發慈悲，傳授長生不老、符水治病等法，俾繼祖傳，普救眾生，蕩邪衛正，報答鴻慈。不勝叩禱之至！”^⑮由此足見其癡迷程度，所以他常常強調“入手速修猶太遲”^⑯。

在長期的修道過程中，鄭觀應不但親自參與了諸多修道活動，還把尋找強身健體、祛除疾病、延年益壽之道的希望完全寄託在修道修仙之中。且不論入室修煉以及煉製內外丹是否能夠發揮理想的效果，僅從長期罹患多種慢性疾病以及生命與生活質量並不算高的鄭觀應最終能夠享壽 79 歲，即無法否認這與他常年修道不無關係。

三

《後編》直接體現了鄭觀應對於近代中國道學發展所做出的貢獻。

鄭觀應對近代中國道學發展的主要貢獻，體現在其對道學經典的解讀、辨偽、整理與出版，他曾將眾多的道家著作進行彙編：

將《皇帝龍虎經》、《陰符經》、呂純陽祖師、張三豐祖師、聖僧濟祖師詩文及群仙歌訣、金丹真傳，分為八卷，付諸手民，名曰《道言精義》。……繼刊《唱道真言》、

《多心經》、《清淨經》、《金華宗旨》、《金笥寶錄》、《三一音符》、《天仙心傳問答》、《七真靈文》、《方壺外史》、《慧命經》、《金仙論證》、《陸約庵就正篇》與《林奮千書》、陳抱一的《參同契注釋》、閔小艮先生的《瑣言續》、《古法養生闡幽》、劉止唐先生的《大學古本》、莫月鼎真人與王天君《內煉口訣》等書，交書肆照本發售。

……手輯呂純陽祖師《百句章百字篇》、陳抱一祖師《訓釋道黑幕文》、《詠道詩》、張三豐祖師《打坐歌》、《道要秘訣歌》及《刪正樵陽經》、《玉液還丹秘旨》，抱仁子《重訂玉液還丹秘旨》，李含虛真人《收心法》，希一子《補天隨功候篇》、《太微洞主授鄭德安玄關口訣》，尹真人《添袖凝神入竅法》、《神息相依法》、《聚火開關法》、《治心法》、《築基全憑橐籥說》、《元性元神說》、《歸根覆命說》，邱祖師《秘傳大道歌》，太虛真人《道程寶則》，止唐先生《論道四則》，陸潛虛真人《內外藥論》。……並錄文先生《易學歧途辨》、陳真人《翠虛吟編》為一冊，名曰《還丹下手秘旨》。^⑩

以上僅僅是鄭觀應在一篇文章中所羅列的由他親自編輯刊行的道學書籍，計有 42 種之多。除此之外，鄭觀應還刊印了《道法紀綱》、《玄中直指》、《呂祖全書》、《古書隱樓藏書》等其他數十種重要的道家著作或著作彙編。

除刊印道學書籍外，鄭觀應還對道學理論與實踐進行了深入研究。數十年的求道生涯，使鄭觀應對於道家各派、各宗、各門幾乎都有所接觸，長時間的鑽研更使他對道家各派的特點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見解，這些都在《後編》中有直接闡述。比如，對於道家的派別之爭，鄭觀應說：

余雅志元門，訪道冊載，見夫世之談道者，宗南派則詆北派言性不言命，宗北派則詆南派言命不言性。其實得真傳者，無不洞曉陰陽，深澈性、命雙修之旨。……然南派雖重陰陽，實不離乎清淨。其所謂氣交形不交慾，先了命而後了性耳。北派雖重清淨，亦非不曉陰陽。其所謂自無生有，蓋陰極則陽生，由盡性而至於命也。惟其中火候南、北各異。^⑪

不僅如此，鄭觀應還將道學與籌集賑災資金進行了直接關聯，他為勸捐而刊行的基於道教因果報應理念的《富貴源頭》、《成仙捷徑》等書，對連年開展的賑務活動的運行發揮了積極作用。

四

《後編》全面介紹了鄭觀應所從事的修道活動及其與道界人士的關係。

《後編》開篇卷一即為《道術》，收錄了他為重刊道學經典書籍所寫序言以及各種道友通信函件近百篇。不僅如此，《後編》開頭結尾共有六篇序言、一篇跋文，其中頭三篇直接與道學相關，分別是《玉封通明教主權聖定一普濟真君陳抱一祖師〈道術〉編序文》、《鄭觀應道師萬啟型序》和《匡廬山觀妙道人序》。更令人注意的是，《後編》的唯一一篇跋文的作者香山張文湛同樣係道界中人。很顯然，就《後編》的整個章節安排以及序言、跋文作者的身份而言，不難看出道學在鄭觀應心目中以及在《後編》中的地位與份量。

鄭觀應一生好道，特別是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更是完全癡迷，跟著江湖術士萬啟型做了許多常人難以理解的事情，同時也與整個中國的道界建立了廣泛而又複雜的關係網。同樣，在如何與道界人士建立關係，特別是他如何與所謂的聖師萬啟型結識並追隨其進行各種修道活動，《後編》中都有所體現。例如，在萬啟型為《後編》寫的序中就敘述了他與鄭觀應結識的經過：

余幼習舉業，每於作策論時，論及時事洋務，必涉獵《盛世危言》一書，由是知鄭

君陶齋之名。……迨甲寅季秋，以奇緣得遇仙師陳抱一先生，授以天元秘旨，囑為廣傳大道。四方之士踵門而求道，紛紛不絕。陶齋先生聞之而不寐，極託觀妙道人為之介紹。乙卯春間，陳師降臨，首授先生以玄科秘旨，嘉歎無已，甚惜相遇之太遲。自是先生來揚州受訣，始得一親德範。^⑩

從萬啟型的描述來看，二人結識是鄭觀應慕其名，託觀妙道人介紹的結果。萬啟型也早已久聞鄭觀應大名及《盛世危言》，有惺惺相惜之感。鄭觀應對萬啟型深信不疑，把自己修道的希望全部寄託在他身上，曾寫信表明心跡，請求賜予神丹，為其今後的修行指明方向：

清淨無功服食難，不得已乞女金丹。昔年承教應如是，老須借此救衰殘。……卻垂死病妙更玄，非師指示不能醒。勢迫千瀆救垂危，故將苦況訴天知。如蒙憐憫無藥產，不賜靈丹賜玉芝。^⑪

對萬啟型經濟上的要求，無論是建造修真院、購置道產、刊印道書或是開壇法事，鄭觀應無不傾囊相助。對於鄭觀應在修道成仙方面的請求，萬啟型屢次假託所謂陳抱一祖師“傳諭”，讓鄭觀應到揚州入室修煉，傳授“秘訣”、提供所謂的神丹仙水，以此“糊弄”鄭觀應。鄭觀應甚至還追隨萬到廬山避暑修煉，但對於鄭觀應真正需要的能夠包治百病和延年益壽的“神丹”，萬啟型卻總是以各種理由搪塞，或者即使提供了也無法達到他所吹噓的效果。至於萬啟型提供的所謂神丹仙水到底是怎樣煉成的東西，到底對人的身體有沒有傷害，有多大傷害，也無從得知。對此，鄭觀應不作他想，而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堅定地認為是自己修行太晚、修煉不夠，說是“自慚德行薄，疊遇野狐禪。……奈何精氣薄，三寶不能圓”^⑫。

鄭觀應相信萬啟型，也相信萬啟型捏造的陳抱一、張三豐祖師“慈愛如父母，保護更周全”^⑬。《後編》收錄的鄭觀應與揚州道友的諸多通信中，可以看到鄭觀應對萬啟型的虔誠之心。鄭觀應曾告訴自己的弟弟和兒子，說終於找到了真人、得到了真傳：

余少年多病，愛讀仙經養生之書。……夙抱成仙救世之苦志，遍處求師訪道，於茲五十餘年。至人難遇，大藥難煉，備嘗艱苦。逮晚年始獲真傳。^⑭

在寫給道友張靜生的信中，鄭觀應寫道：

前歲幸我度師萬雲軒先生憐予苦志，代稟陳抱一祖師，傳授玄科口訣，行已三年。今夏復蒙准予入室，忻幸無極，以為指日可得還丹。不料入室百餘日，只通關竅，尚未得丹，不能隨同學連袂而上，累師操持，實深慚感。若謂恐非累行積德，動有群魔作障。^⑮

在寫給揚州修道院諸道友的信中，鄭觀應仍然對萬啟型宣稱的所謂入室修煉堅信不疑，認為未得“龍虎大丹”是自己心太急躁的緣故：

昨在九江，萬師臨行手諭，觀應入室兩月以來，關竅幸開，玉液已還，可救護老殘。雖遺精可以採補，此功效之著也。惟龍虎大丹未得，終非上品。弟心甚急，故屢次用法行收，而年高德薄，每升火則承受不住，非是遺精即肝火旺，只好緩緩培補。待九、十月間來揚，當設法圖之，並請示陳師指示遵行。今接萬師自揚來諭：“秋燥不能收丹，須待至冬至後方可收丹，如即來揚，只可養性”等語。兩諭之意，體貼下情，殊深慚感，自應遵諭循序而行，冀邀天眷，不敢奢望。^⑯

而就在鄭觀應滿心希望地追隨萬啟型修道之際，這位自稱得到陳致虛上陽真人神丹與天元秘旨的江湖術士，突然於1919年病亡。這個年齡比鄭觀應小了許多，號稱有陳抱一和張三豐庇護、獲得真經秘旨且能夠煉得仙丹且被鄭觀應尊為“聖師”的“得道高人”，連自己的命都無法保住，

足以說明其一切行為都是騙術。鄭觀應對此非但沒有看透，反而對萬啟型的死悲痛不已。他悲痛的不但是萬啟型的突然亡故，更為痛心的是，自己歷經千難萬險才有緣遇見的“聖師”就這樣先他而去，自己從此失去了修道成仙的方向。

鄭觀應與萬啟型之間的關係，在鄭觀應與道界人士的關係中具有代表性，在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往中也具有代表性。這是一種典型的為自己帶來負面效應大於正面效應的人際關係，儘管鄭觀應自己並不這麼認為。一方面，鄭觀應有著急切的修道成仙以延年益壽的需求；另一方面，萬啟型種種迷惑人心的騙術，能夠滿足鄭觀應的這種心理需求。對於萬啟型來說，作為一個江湖術士，有鄭觀應這樣有錢有地位的人信任他、崇拜他，那麼他無論如何都會想盡辦法獲取鄭觀應的進一步信任，並跟著自己事先設定好的騙局一步一步走下去。這樣，即使周圍的人都在懷疑這種騙局，但只要鄭觀應深信不疑，萬啟型就能夠不斷地從鄭觀應那裡獲得名聲和經濟上的收益。鄭、萬二人的關係，從經濟利益的層面來看，說到底，並不是互惠的，而是單向收益的。鄭觀應曾有詩云“十萬黃金撒手空”^⑥，足見花費了金錢無數。不過，鄭觀應追隨萬啟型修道，也並不是一無益處。至少這種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鄭觀應的精神需求，有某種心理慰藉作用。關於自己大致的求道歷程以及重要的修道活動，他同樣在《後編》中予以說明：

求道已五十年，凡有有道之士，靡不執贄求教，指示迷津；凡有善事，無不盡力捐助，冀消魔障。奈夙孽重、德行薄，雖不憚跋涉，北至京、奉，南至閩、浙，東至芝罘，西至巴蜀，曾經護師入室：江西萬先生三次，四川廖先生二次，江蘇徐先生潛修十年；江蘇丁先生，四川陳先生、徐先生，雲南楊先生，福建彭先生，敝省蘇先生，均已行功數月或年餘，小有應驗，無大效果，不能如金丹真傳所論立竿見影：行之五月而體貌異，九月而丹成。^⑦

除了萬啟型外，黃邃在鄭觀應晚年修道的經歷中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清末孫寶瑄^⑧所著《忘山廬日記》，對他的事蹟記載極詳。黃邃，字邃之，江西臨江人，“長於內外丹法並陰陽數術”，原名益齋，號通邃散人，人稱黃道人、益道人，曾為官宦，與蘇州玄妙觀等道觀道士頗有往來，後移居上海，平時結髮髻、著道服，以賣草藥及書符錄為生。他曾經分別參與鄭鼎臣^⑨和陳櫻寧^⑩的外丹爐火燒煉實驗。其《女丹詩注》序云：“（鄭、陳）二君對於地元丹法，都得真傳。而地元一項，又皆不畏勞苦，親自臨爐，雖魔障迭起，寒暑屢遷，仍未嘗稍挫其志。余既周旋二君之間，亦多次參預實驗之役，即外事以證內功，獲益匪淺也。”不僅如此，在煉丹方面，黃邃還積極利用西方近代科學，不惜鉅資以實踐驗證其中一些原理。陳櫻寧在其辭世時，曾致送挽聯，曰“逆境困賢才，為生活，老華年，歲月蹉跎，當前誰是超凡客？南宗稱知己，證師傅，談妙悟，源流指掌，今後難逢第二人”。^⑪可見，在當時上海，黃邃在道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還是不小的，所以到處求道的鄭觀應自然也與之結識。《後編》中收錄了《致化學黃君邃之、醫士呂君獻堂、佛學研究會張君潤生書》、《致孫君仲瑜、鄭君鼎臣、黃君益齋》等鄭、黃之間信件數通，《羅浮待鶴山房談玄師草》中也有《與通邃道友談時世感作》詩文。其中，《與鄭君鼎臣、黃君益齋論黃白書》有“昨聆高談，藉悉研究黃白之術有年，現承杭州孫君護法試辦，弟愧綿力，未能厚助”云云，即鄭觀應在“聖師”萬啟型之外，也高度認可了鄭、黃二人的煉丹術。鄭觀應在接受鄭鼎臣、黃君益道術的同時，經濟方面的資助隨之跟上，陳櫻寧的《業餘講稿》說“民國十年以前，鄭（鼎臣）、黃二君合租屋於上海虹口三角小菜場相近，專門燒煉。二房東乃廣州盧君，出資者乃香山鄭君”，這裡的香山鄭君就是鄭觀應。

五

由上可見，在與道界人物的交往中，鄭觀應不但是積極的參與者，還是熱心的資助者，亦如他自己所說的，如萬、黃之類的道界人士，在他數十年的尋道求仙歷程中，不知道結交了多少。除了萬、黃二人之外，在鄭觀應的道界關係網中，還有很多志同道合的道友，他們的名字，以及他們之間進行的修道事蹟幾乎都在《後編》中出現過。在進行相關比對和梳理之後，這些道友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人，一種本身就是道界中人，比如他在修真院中的同學、各地道士與道師；另一種原本就是他的好友，在修道方面有了共同的興趣，比如張振勳、龔易圖、梁綸卿、吳瀚濤等人。

前一種人，通過鄭觀應頻繁的通信記錄及其撰文中就可以得到比較全面的梳理。這些信件與撰文除記錄鄭觀應所參加的修道活動外，還反映了與各方道師、道士、道友交流道學與心得的情況。其中涉及的道友，除了前文提及的萬啟型、黃邃、鄭鼎臣之外，還有楊紫京、楊潤畬、彭凌虛（羅浮道人，曾傳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三步口訣與鄭觀應）、胡仰山、曹一峰（師從張歐治，曾寄送王重陽祖師傳授《七真靈文》五篇與鄭觀應）、養玄子（道號，青城道士，姓潘，名無從查證）、羅人楷、楊了悟、何善園、陳靈甫、盧鈞堂、司新三、黎燦階、劉傳林（蘇州道友，號稱幼暮仙道已獲真傳）、劉宣甫（自稱行柳華陽禪師之法）、孫仲英、呂獻堂（醫士，喜好煉丹）、羅夢秋、譚荷生、何善園、李錦川、戴白陽（煉丹方士）、裴遠塵、劉甸侯、陳抱珍（鄭觀應女道友）、劉和毅（道士，曾開藥茶與鄭觀應治療痰喘）、何潤生、廖舜卿（煉丹方士）、楊超伯（號崧嶠山人）、張靜蓉（鄭觀應女道友）、孫子遜（曾示鄭觀應《玄關玉洞雙開鉛火論》）、許奏雲、楊了塵（道士，曾送鄭觀應青華秘文《金笥寶籙》）、汪樂川（曾贈鄭觀應《天仙心傳問答》）、夏雨人（曾贈鄭觀應《三一音符》）、王新甫（湖南道士）、胡滋甫（風水先生）、楊海秋（湖南方士，曾到上海開設呂祖乩壇，號稱所造符水能夠治癒鄭觀應哮喘病）、蕭文齋（湖南方士）、張歐治（號稱得到修囉教主真傳，佛法無邊）、周鐵丸、方內散人（江西南昌人，內丹大師，著有《南北合參法要》一書，所傳丹法，世稱江西派）、黃瑞亭（四川道友）、黃葵生（曾示費曉樓《陰陽文圖證》繪本與鄭觀應）、武夷沈（羅浮居士）、孫仲瑜（即前文述及的杭州孫君，其與鄭觀應同為修道愛好者和資助者）、張一明、徐棟（自稱“上海道人”，鄭觀應最初追隨的道師）、戴公復（匡廬山觀妙道人）及羅浮山諸位道人等。這些人大多數是當時各地道界的活躍人物，大多數人的具體身份難考，只能憑鄭觀應存世文稿探究一二，若能假以深入考證，或可釐清其中一部分人的生平事蹟。

後一種道友的身份並非道術方士，有的原本就是好友，後來基於共同的修道愛好，一起參與了修道活動或經常交流道學，這類人有：梁倫卿、張振勳、龔易圖、沈荔虎、貴昆仲、吳廣霈（即吳瀚濤，自稱劍華道人，鄭觀應輪船招商局同仁）、郭春秧（曾任漳州道）、張潤生（香港道友，佛學研究會成員）、徐亞東（上海道德會醫士）、張靜生、沈星海、袁爽秋（曾任蕪湖道）、何卓勳、伍廷芳、張謇、楊綏卿、陸曉帆、馬月樵（曾與鄭觀應、張振勳合資重刊《方壺外史叢編》）、羅星譚（四川道友，亦為官場中人）、潘飛聲（著名書畫家、詩人）等人，鄭觀應的摯友兼上司盛宣懷晚年也表現出了對求道的興趣。

總之，通過對《後編》特別是卷一道術部分的詳細梳理，可以非常清晰地尋找到鄭觀應的修道活動及其與道界人士關係的大致脈絡，不僅如此，在鄭觀應所著《待鶴山人晚年紀念詩》、《羅浮待鶴山房談玄師草》中，同樣有大量的線索可以深入研究，如果輔以他所重刊的道學書籍以及

其他相關道學典籍和史料，當可還原鄭觀應一生所癡迷的道學修煉及其在近代中國道界構建的人際網絡。

①如武曦的《鄭觀應與道教關係及其“道器”觀》

(南昌：《江西社會科學》，1991年第6期)、王煜的《鄭觀應的道教思想》(成都：《宗教學研究》，1996年第3期)、鄧景濱的《鄭觀應道號及學道始年考》(廣州：《學術研究》，1996年第5期)、張秀麗的《鄭觀應的道教信仰與經世實務關係》(上海：《史林》，2007年第6期)、潘慎的《清末詩人鄭觀應的改良主義與道教信仰》(太原：《太原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盧偉的《鄭觀應道教思想研究》(合肥：安徽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吳國富的《鄭觀應學道經歷探幽》(北京：《中國道教》，2012年第3期)、徐龍的《試論近代實業家的道教信仰——兼論鄭觀應求道濟世思想》(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賀瓊的《鄭觀應〈續劍俠傳〉及其道教思想研究》(廣州：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等。

②熊月之：《近代中國讀書人的命理信仰》，上海：《學術月刊》，2015年第9期。

③《盛世危言增補統編序》，轉引自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520頁。

④見《鄭觀應年譜長編》，第678頁。

⑤參閱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編輯說明注1。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第14頁；第60頁；第46～47頁；第1182頁；第95頁；第48、71頁；第1485頁；第924～925頁；第71頁；第43、48、72頁；

第167～168頁；第84～85頁；第3頁；第1471頁；第1468頁；第1466頁；第107頁；第104頁；第114頁；第1461頁；第47頁。

⑬××年六月八日《××至鄭觀應藥方》，盛宣懷檔案，索取號090107-1。

⑭字仲瑜，浙江錢塘人，生於同治十三年(1874)，卒於1924年，曾在清朝工部、郵傳部、大理院等處任職，民國初年任寧波海關監督。家族顯赫，父孫詒經在光緒年間任戶部左侍郎；兄孫寶琦在光緒年間任駐法、駐德公使，民國後曾任北洋政府內閣總理；岳父李瀚章曾任清兩廣總督。

⑮內丹大師，常與鄭觀應、黃遵討論煉丹之事。

⑯原名元善、志祥，字子修，後改名櫻寧，道號“櫻寧子”，祖籍安徽懷寧，世居安慶。曾主筆《揚善半月刊》及《仙道月報》，興辦《仙學月報》與《道協會刊》，著作頗豐，內容涉及丹道、史論等，共計有《黃庭經講義》、《楞嚴經釋要》、《教理概論》、《靜功總說》、《靜功療養法》、《仙與三教之異同》等近30餘種，有“仙學鉅子”之譽，被道教界敬譽為“當代的太上老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聘為浙江省文史館館員，並擔任中國道教協會會長。

⑰上海：《揚善半月刊》，第86期(1937年1月16日)。

作者簡介：邵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上海 200235